

禪月集

校注

陸永峰 著

Chan Yue Ji Jiao Zhu



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

禪月集

校注

陸永峰 著

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禪月集校注 / 陸永峰著 . 一成都: 巴蜀書社,
2012. 6

ISBN 978-7-5531-0000-5

I. ①禪… II. ①陸… III. ①唐詩—選集②唐詩—
注釋 IV. ①I222.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2) 第 070121 號

禪月集校注

陸永峰 著

策劃組稿	譚曉紅
責任編輯	譚曉紅 楊宗義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
	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
	總編室電話: (028) 86259397
網 址	www.bsbook.com
發 行	巴蜀書社
	發行科電話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經 銷	新華書店
印 刷	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版 次	2012 年 6 月第 2 版
印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3mm×140mm
印 張	18.875
字 數	460 千
書 號	ISBN 978-7-5531-0000-5
定 價	45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發行科聯繫調換

本書屬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

前言

詩僧盛於唐，靈一以下，靈澈、皎然、齊己皆馳名於世，而貫休尤爲特出。其奇異的經歷、多樣的才華、強烈的個性、獨樹一幟的詩風，都使得他在唐五代的詩僧中顯示着獨特的魅力，引起人們深切的關注。

一

貫休，字德隱，俗姓姜氏，婺州蘭溪縣（今浙江蘭溪市）登高里人，生於唐文宗太和六年（832）。生平見曇域《禪月集後序》、五代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卷二十、《宋高僧傳》本傳、宋張唐英《蜀檣杌》卷上、宋釋文瑩《續湘山野錄》、宋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卷七五、元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卷十、清吳任臣《十國春秋》卷四七等。其弟子曇域作《禪月集後序》，言其“家傳儒素，代繼簪裾”。貫休的家庭似已衰落，其《經弟妹墳》詩云“年長於吾未得力，家貧拋爾去多時”。貫休七歲出家於本縣和安

寺圓貞長老處。少年的貫休能“日念《法華經》一千字，數月之內念畢茲經”（《禪月集後序》），與鄰院的處默，“每隔籬論詩，互吟尋偶對”（《宋高僧傳》本傳）。

貫休二十歲受具後，即入山依從無相道人，開始了十年苦行。其《桐江閑居作十二首》之十一言，“憶在山中日，爲僧鬢欲衰。一燈常到曉，十載不離師”。《聞無相道人順世五首》之二言“自昔尋師日，顛峰絕頂頭”。之三言“一別三十年，煙水空茫茫”，之四“石霜既順世，吾師亦不住”。無相圓寂當在石霜慶諸後不久。據《宋高僧傳》知，石霜於昭宗光啓四年（888）圓寂，貫休時年五十七。上推三十年，則貫休約在二十至三十歲間，在無相座前。其與赤松山道士舒道紀的交遊，或也始於此時。

貫休雖在山中苦行，但也有出遊的經歷。唐宣宗大中十一年（857），貫休來到婺州東南方向的處州，謁見時任刺史的段成式（《上縉雲段使君》）。十三年，又至荆楚，曾與南楚才人一起賦詩相送道士軒轅集（《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山》、《贈軒轅先生》），詩名大振。

貫休《山居詩二十四首》自序言：“愚咸通四五年中，於鍾陵作《山居詩二十四章》，則貫休至遲在咸通四年（863）已至南昌。貫休先在南昌開元寺受學研讀。數年後，開講《法華經》、《起信論》（《宋高僧傳》本傳、《禪月集後序》）。期間，“三冬涉學，百舍求師”，多方參學。終至有所成就，“於時江表仕庶，無不欽風”（《禪月集後序》）。貫休此時也與隱居西山的處士陳陶相交甚洽。有《書陳處士屋壁二首》、《春寄西山陳陶》等詩。

貫休曾來往於鄱陽（即饒州，治今江西鄱陽）、廬山等地。

在鄱陽，與刺史盧知猷交往。盧知猷咸通中任饒州刺史，擅詩文與書法。貫休相關之作有《上盧使君》、《謝盧少卿惠千字文》等十八首之多。

貫休離開鄱陽後曾上廬山，師從東林寺大願和尚（《聞大願和尚順世三首》）。其《寄大願和尚》詩言“自憐亦似師子子，未逾三載能嗔呻”，其時間當在三年左右。

貫休參訪石霜慶諸禪師（807～888）或也在此時（參本書卷九《聞無相道人順世五首》“石霜”注。）。慶諸禪師光啓四年示寂，之前他入石霜山（位於今湖南瀏陽）達二十年（《宋高僧傳》本傳）。869年，慶諸已在石霜山。貫休在其返回家鄉前，來到慶諸禪師門下，與另一位詩僧齊己成爲同門，並任知客僧一職。

大約是在咸通末年，貫休回到家鄉婺州（《別盧使君歸東陽二首》），並開始雲遊吳越。貫休到過睦州，與刺史馮岩交往，閑居於桐江畔，有《桐江閑居作十二首》。馮岩咸通十二年（871）十二月至十四年十二月任睦州刺史，貫休閑居桐江正在此間。貫休酬贈馮岩的詩作有《擬齊梁體寄馮使君三首》、《秋末寄上桐江馮》等二十五首之多。貫休還與新定桂雍（《寄新定桂雍》、《聞新蟬寄桂雍》）、隱居鏡湖的方干（《春晚訪鏡湖方干》）交往。

乾符初，貫休復至睦州，與刺史宋震交往。有《寄宋使君》、《上新定宋使君》等詩。乾符三年至五年（876～878），王慥任婺州刺史，貫休深受器重，有《循吏曲上王使君》、《寄拄杖上王使君》等作。

廣明元年（880）六月，黃巢別將攻破睦州、婺州。貫休身當其中，有《東陽罹亂後懷王慥使君五首》、《避寇山中作》、《避寇上唐臺山》等詩，訴說戰亂中的見聞感受，及懷念故人之情。

貫休在兵亂之中，受到東安都將杜稜的關護，有《杜侯行》。

不久，貫休離越，前往相對安定的毗陵（今江蘇常州），依刺史孫徽。有《上孫使君》、《避地毗陵寒月上孫徽使君兼寄東陽王使君三首》諸詩。此後，貫休應再至廬山，有《再遊東林寺作五首》。《宋高僧傳·棲隱傳》也言棲隱廣明中，避巢寇入廬山折桂峯，平常與貫休、處默、脩睦為詩道之遊。

《宋高僧傳》言，婺州太守蔣瓌開洗懺戒壇，命休為監壇。《新唐書·僖宗本紀》載，中和四年二月，“浦陽將蔣瓌陷婺州。”同書《昭宗本紀》言，景福元年十一月，“孫儒將王壇陷婺州，刺史蔣瓌奔於越州。”又《舊唐書·昭宗本紀》，乾寧二年三月，“浙東節度董昌僭號稱羅平國，年稱大聖，用婺州刺史蔣瓌為宰相”。則蔣瓌任婺州刺史在中和四年（884）至景福元年（892）間。貫休在此期間，回到婺州主持戒壇。

之後，貫休又有北上之遊。其《淮上逢故人》言“故園離亂後，十載始逢君”，“故園離亂”當指廣明元年六月黃巢別將攻陷婺州，十年則約在昭宗大順元年（890）前後。此時貫休已在北遊途中。他曾至長安，憑吊詩僧棲白的薦福寺舊院（《經棲白舊院二首》）；在恒州真定府，瞻仰普化禪師的影院（《經普化禪師影院》）；可能還到過薊州（《薊北寒月作》）。貫休的邊塞詩作與其北遊見聞應該有很大關係。

貫休與錢鏐的交往，《宋高僧傳》、《續湘山野錄》、《唐詩紀事》等皆載之。唯曇域《禪月集後序》不言。宋釋文瑩《續湘山野錄》中言，唐昭宗以錢鏐平董昌功，拜為鎮海、鎮東節度使、中書令，錢自稱吳越國王。貫休以詩投之，有“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光寒十四州”句。錢鏐論改“十四”為“四十”，方相

見。貫休言：“州亦難添，詩亦不改，然閑雲孤鶴，何天而不可飛耶？”於是“飄然入蜀”。則其與錢鏐交往在赴蜀前，兩者的不合正是其入蜀的原因。此說為通行。宋釋贊寧《宋高僧傳》則言，貫休謁錢鏐在乾寧初赴荆南前，且深受器重。“王立去偽功，朝廷旌為功臣。乃別樹堂立碑，記同力平越將校姓名，遂刊休詩於碑陰，見重如此”。《全唐詩》小傳本之。關於貫休所獻之詩的可疑，研究者業已辨明，不贅言（參本書卷二十六）。贊寧（919～1001）吳越時曾任兩浙僧統，去貫休未遠，所言當為可信。宋人錢儼《吳越備史》卷一言，昭宗景福二年（893）九月制，授錢鏐鎮海節度、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、潤州刺史。先此，“又周寶蒞丹陽，州人凡有期，必曰‘待錢來’，斯之應也。蜀禪月太師休公嘗上詩曰：‘今日再三難更讓，餞辭唯道待錢來。’”則景福年間，貫休已見錢鏐。與《宋高僧傳》所載相合。

貫休與錢鏐最終的不融洽也是顯然的。否則很難解釋，現存《禪月集》中竟無一首關於錢鏐的詩作。這樣的詩作應當不在少數，一首不存，解釋為散佚，似過於牽強。其弟子曇域作《禪月集後序》，更無一言及之，也當是深有其因。貫休究竟因何與錢鏐交惡，終致離越，已不可知。或與錢鏐的窮奢極貴、貫休不羈的個性相關。

《宋高僧傳》言貫休離越後，“自此遊黟歙，與唐安寺蘭闍梨道合”。黟縣、歙縣時屬歙州，歙縣為州治（今屬安徽）。蘭闍梨，又稱瀾公，即清瀾。貫休有《寄瀾公二首》。曇域《禪月集後序》言貫休“後隱南嶽，深居不出……遂乃過洞庭，趨渚宮，歷白帝”，則其赴荆南前，曾隱居衡山。《宋高僧傳》本傳也言，貫休遊黟、歙後，“後思登南嶽，北謁荆帥成汭。初甚禮焉，於

龍興寺安置”。《武昌縣與晝公兼寄邑宰》、《鄂渚贈祥公》等詩，當作於赴江陵途中。吳融《西岳集序》言其謫官至江陵，與貫休交遊，“如此者凡期有半……丙辰，余蒙恩詔歸，與上人別，袖出歌詩草本一，曰《西岳集》”。丙辰即乾寧三年（896）。貫休《送吳融員外赴闕》詩言“雲寒猶借雪，燒猛似烹山”，則吳融歸京在是年冬，之前與貫休交遊有一年半。那麼，貫休至遲乾寧二年秋已至江陵，其別集乾寧三年已編成。貫休在江陵，最初深受成汭禮遇，有《上荆南府主三讓德政碑》。與吳融、姚洎（《送姚洎拾遺自江陵幕赴京》）、張道古（《送張拾遺赴施州司戶》）等交遊。

《宋高僧傳》言，貫休“尋被誣譖於荆帥，黜休於功安”。功安，即今湖北公安。五代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以下諸書則言被遞於黔中。黔中治彭水（今屬重慶）。《北夢瑣言》卷二十《休公真率》言，成汭向貫休請教書法，後者言“此事須登壇而授，非草草而言”。成汭怒而貶之。其《秋末寄張侍郎》言“靜住黔城北，離仁半歲強”，作於赴蜀途中的《遊雲頂山晚望》詩言“黔南在何處，堪笑復堪悲”，則其被貶之地當以《北夢瑣言》所言爲是。據《舊唐書·昭宗本紀》，乾寧三年（896）五月，成汭驅逐武泰節度使王建肇，據有黔中。貫休被貶當在此後。

貫休《春晚寄張侍郎》詩言：“遙想涪陵岸，山花半已殘。人心何以遣，天步正艱難。（原注：時昭宗在岐下。）鳥聽黃袍小，城臨白帝寒。應知窗下夢，日日到江干。”此詩寄與時在涪陵的張侍郎。此張侍郎與前及《秋末寄張侍郎》中者爲同一人。詩當也作於貫休在黔中時。涪陵與黔中相鄰。“時昭宗在岐下”，指昭宗天復元年（901）年十一月，宦官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，

劫帝奔鳳翔。至天復三年正月始還長安。詩題“春晚”當係天復二年暮春，則貫休天復二年暮春仍在黔中。參以《秋末寄張侍郎》詩言“靜住黔城北，離仁半歲強”，則其被貶當在此年年初左右，秋末仍在黔中。

此事之後，貫休即開始了赴蜀的旅程。其入蜀固然有對成汭的失望，《宋高僧傳》言貫休因被流放，“鬱悵中題硯子曰‘入匣始身安’，弟子勸師入蜀”。同時巴蜀的相對安寧，“河北江東處處災，唯聞全蜀勿塵埃”（《陳情獻蜀皇帝》）；王建的好文求賢，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六六言，“蜀主雖目不知書，好與書生談論，粗曉其理。是時唐衣冠之族之避亂在蜀，蜀主禮而用之，使修舉故事，故其典章文物有唐遺風”，對貫休應也有着巨大吸引力。《秋過相思寺》、《遊雲頂山晚望》，正是此次旅行的記錄。貫休至成都的時間，曇域《禪月集後序》有“十年已來，迴承天睽”之言。從貫休去世之前蜀永平二年（912）十二月上推，則其到達成都在天復三年（903）。貫休赴蜀在天復二年秋末應已開始，其《三峽聞猿》中言“應棲多月樹，況是下霜天”，《遊雲頂山晚望》中言，“菊歇香未歇，露繁蟬不飢”，正是深秋情景。《到蜀與鄭中丞相遇》題中言“到蜀”，當為其初到蜀地之作。詩言“劍閣霞粘殘雪在，錦江香甚百花開”，亦為初春景象。齊己《寄貫休》詩言：“子美曾吟處，吾師復去吟。是何多勝地，銷得二公心。錦水流春闊，峨嵋疊雪深。時逢蜀僧說，或道近遊黔。”詩寫蜀中深冬初春之景，末兩句可證此詩當作於貫休入蜀後不久。則貫休至遲天復三年年初當已到達蜀地。此外，如將其《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》定為天復三年正月作（參本書中此詩注釋），則貫休至遲此時已在成都。

貫休在成都深受王建禮遇。《宋高僧傳》言，王建對之，“盛被禮遇，賜資隆洽，署號禪月大師”。曇域《禪月集後序》也言王建“曲加存恤，優異殊常”。貫休在成都先駐錫東禪院，後王建爲專建龍華道場。其所獲封號爲“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辯果功德大師、祥麟殿首座引駕內供奉講唱大師、道門子使選鍊校授文章應制大師、兩街僧錄封司空太僕卿雲南八國鎮國大師、左右街龍華道場對御講讀大師兼禪月大師、食邑八千戶賜紫大沙門”。王氏對貫休的重惜可見一斑。貫休稱頌建王的詩歌總數也達二十一首。居蜀期間，貫休還與韋莊（《和韋相公話婺州陳事》、《酬韋相公見寄》）、張格（《酬張相公見寄》）、王鐔（《酬王相公見贈》）、周庠（《酬周相公見贈》）等人交遊酬唱。

前蜀永平二年（912），貫休卒於成都，壽八十一。遺言薄葬，王建仍隆禮以葬之。曇域《禪月集後序》言，“先帝戚然久之，乃命所司備一期葬事”，“勅令四衆，共助葬儀，特豎靈塔，勅謚白蓮之塔。以癸酉年三月十七日，於成都北門外十餘里，置塔之所，地號昇遷”。

二

在唐五代詩僧中，貫休經歷可謂豐富，其才華也是超凡的。《全唐詩》小傳言其“既精奧義，詩亦奇險，兼工書畫”。貫休的佛學修養，從其詩歌來看，與一般的禪僧相較並無超絕處。但從相關記載來看，貫休應是廣涉佛典，深悟佛禪之人。他曾在時爲禪學中心之一的洪州開講《法華經》、《起信論》。《宋高僧傳》言

其“皆精奧義，講訓且勤”，當非虛言。他所獲得的尊崇，當也與其佛學修養相關。但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二七《禪月貫休禪師》載：“禪月詩云‘禪客相逢只彈指，此心能有幾人知’，大隨和尚舉問曰：‘如何是此心？’無對。”貫休此處表現似未為徹悟。這裏缺乏進一步的資料，來探討其禪學修養。

貫休為著名的書僧、畫僧。《宋高僧傳》言“休書跡，好事者傳號曰姜體是也”；宋黃休復《益州名畫錄》卷下謂貫休善草書，故《宣和畫譜》卷三載“時人或比之懷素”。懷素善草書，馳名唐代。將貫休與之相比，可見推許。

貫休的畫藝尤以畫羅漢而著稱。《宋高僧傳》言其“長於水墨，形似之狀可觀。受眾安橋強氏藥肆請，出羅漢一堂。云每畫一尊，必祈夢得應真貌，方成之，與常體不同”。《益州名畫錄》卷下言其師閻立本，畫羅漢十六幀，“蕃貌梵相，曲盡其態。或問之，云休自夢中所覩爾”。貫休所畫羅漢與眾不同，蕃貌梵相，而具怪異蒼勁之美。夢中得相的傳說，表明了畫藝的高明與脫俗。五代歐陽炯《禪月大師應夢羅漢歌》對貫休畫藝有詳細的描繪與誇讚。貫休的受歡迎、尊崇，與他精通書畫應大有干係。

貫休專擅縱放恣肆的草書，其羅漢畫也怪異脫俗。其才藝上的與眾不同，不拘俗套，與真率自然、豪放不羈的個性是相一致的。《北夢瑣言》卷二十《休公真率》言，貫休“舉止真率，誠高人也。然不曉時事，往往詆訐朝賢，他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”。貫休在荆南時，不懼成汭之威，拒絕教其書法；在蜀，於王建與眾貴戚座中，誦《少年行》，譏刺貴戚祇知享樂，而不關心時世（《蜀檣机》卷上）；與馮涓初次見面，即“欣然撫掌曰：‘我與你阿叔有分。’”，致對方“怒而拂袖”，不願相見。而貫休却不解，

乃言“我得得為渠入蜀，何意見怪”。“通衢徒步，行嚼果子，未嘗跨馬”（《北夢瑣言》卷二十《休公真率》），這些都反映着貫休真率而豪放的個性。獻詩錢鏐、在高季興處賦《酷吏詞》兩事，雖不可靠。但也與其個性相合。雖干謁諸侯，出入公卿之門，但不能不為威勢所屈，保持個性與獨立，這正是《北夢瑣言》中言其“異乎廣宣、棲白之流也”的原因所在。而貫休詩中對社會黑暗、不公現象的揭批，以及詩風的豪邁、通俗，也與此相一致。

曇域《禪月集後序》言貫休“家傳儒素，代繼簪裾”，但貫休七歲即出家，家庭影響應該是微弱的。儘管如此，貫休曾飽覽詩書，有着深厚儒學素養却是無疑的。貫休也言及之，如《陽烏燦萬物》詩，“我本事蓑笠，幼知天子尊。學為毛氏詩，亦多直致言”；《懷二三朝友》“我昔讀詩書，如今盡拋也”。其詩歌的遣詞造句，體現出對儒家經典和詩文的熟諳。如《莫輕白雲白》用皇初平典與於公門典；《大蜀皇帝壽春節進堯銘舜頌二首》更是大量採用儒經中的典故，《尚書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都有涉及，並及《莊子》、《楚辭》、《史記》（參本書相關作品的注釋。）。其用典之廣泛與圓融，如果對儒家經典、詩文不是很熟習的話，是很難做到的。

貫休對儒家經典的習讀與其積極的人世情懷相一致。作為方外之人，貫休的人世主要表現為用詩歌反映社會的動蕩與不公，為老百姓的苦難作呼籲，對上層的麻木和惡行作警醒和批判。其《陽烏燦萬物》言“學為毛氏詩，亦多直致言”，《寄馮使君》言“為文攀諷諫，得道在毫釐”，都將自己的創作指為延續《詩經》的美刺傳統。豐富的經歷在此為其提供了無盡的素材。其詩歌中存在着大量關係民間疾苦、揭刺現實的作品。如《酷吏詞》斥太

守的掠奪百姓爲“掠脂斡肉”，並將其享樂與百姓“白其頭，饑其族”的苦難作對比。而他作於前蜀永平二年的《少年行》三首，活畫出了奢華輕薄的貴族子弟形象，突出體現了對權貴的輕蔑和不滿。《偶作五首》第一首言：

誰信心火多，多能焚大國。誰信鬢上絲，莖莖出蠹腹。

嘗聞養蠹婦，未曉上桑樹。下樹畏蠹飢，兒啼亦不顧。一春膏血盡，豈止應王賦！如何酷吏酷，盡為搜將去！蠹蛾為蝶飛，偽葉空滿枝。冤梭與恨機，一見一霑衣。

詩寫蠹婦辛勤操持，最終爲官府盤剝乾淨可以說是字字血淚，字裏行間充滿着詩人對不幸者的深切同情，和對爲惡一方的官吏的不滿和憤怒。

與之相輔相成，貫休在詩中對明君賢臣作了熱烈的頌贊。貫休專門稱頌王建的詩作總數在二十一首。王建是否爲明君，可以討論。但蜀地的安寧與他政治上的相對開明應該是分不開的。我們在讀貫休歌頌他的詩歌時，需要注意的是其中透露出來的貫休心目中的明君的標準是什麼？《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》之二言，“似聖悲增道不窮，憂民憂國契堯聰”；《大蜀皇帝壽春節進堯銘舜頌二首·堯銘》言，“承天眷命，罔厥矜驕。四德炎炎，階莫不凋。永孚於休，垂衣飄飄。吾皇則之，小心翼翼。秉陽亭毒，不遑暇食”；《壽春節進》言，“視物如傷日，勝殘去殺時。守文情的的，無逸戒孜孜”，這正是儒家強調的修明政治，善於納諫，體恤民力，美如堯舜的賢君形象。而《讀離騷經》對屈原的贊美；《陽春曲》中呼籲“爲口莫學阮嗣宗，不言是非非至公。爲手須似朱雲輩，折檻英風至今在”。《讀唐史》之一言“我愛李景伯，內宴執良規”，都見出貫休對忠臣、良臣的仰慕與期盼。

貫休邊塞題材的詩歌，亦是如此。在刻畫邊塞戰士困苦處境的同時，也多宣揚殺敵建功的報國熱情，讚美安定邊疆的良將。如《古塞上曲七首》之四言“征人心力盡，枯骨更遭焚”，寫盡邊塞生活的艱難與無奈。《塞上曲二首》之二則言“男兒須展平生志，爲國輸忠合天地”，“侯封十萬始無心，玉關凱入君看取”，對愛國將士作了熱烈歌贊。

貫休《桐江閑居作十二首》之五言，“詩琢冰成句，多將大道論”。其詩中所論之“大道”，有佛有儒，但以儒家傳統倫理道德爲主要內容。這與儒家詩教傳統相符，其中應當還有佛家慈悲度人的菩薩心腸。如其《貽世》勸告世人人生無常，不要貪戀富貴與長生。《野居偶作》詩言：

高淡清虛即是家，何須須占好煙霞。無心於道道自得，
有意向人人轉賒。風觸好花文錦落，砌橫流水玉琴斜。但令
如此還如此，誰羨前程未可涯。

悟禪需要的是內心的清明空虛，而不必要處山林之間。道的真諦在乎放下執著，順其自然，就好像風中花落、流水過階一般，正在日常無意中得。《行路難四首》之四，勸人行孝，終言“寄言世上爲人子，孝義團圓莫如此。若如此，不遑死兮更何俟”，迫切之情溢於言表。《續姚梁公座右銘》則更爲集中地對世俗作了教導。詩言“忠孝信行，越食逾衣”，“親仁下問，立節求己”等，與儒家所宣揚的倫理道德觀念無二。

吳融《西岳集序》言，“上人之作，多以理勝，復能創新意。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自然之際，然其旨歸必合於道”；《宋高僧傳》言“歌吟諷刺，微隱存於教化”；清胡鳳丹《重刻禪月集序》言“一字一言，無非棒喝”，其道理正在於貫休詩歌中體現的美

刺、教化傳統。

以上所及的貫休，有着強烈的人世情懷，汲汲於爲民、爲社會。而能體現貫休僧家本色的，主要是其清新明快的山水詩作。如《春山行》：

重疊太古色，濛濛花雨時。好峯行恐盡，流水語相隨。

黑壤生紅朮，黃猿領白兒。因思石橋月，曾與道人期。

蒼翠的山色、濛濛的花雨，一路隨行的青山、流水，偶然入眼底的紅朮與猿猴，動靜相宜，交織成一派幽美、清爽的山林景象，而詩人的心靈也與周遭的一切契合、交融了起來，達到了自在閑放之境。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還有《桐江閑居作十二首》、《山居詩二十四首》、《春晚書山家屋壁二首》等。

貫休詩中言“伊余吟亦苦，爲爾一眉嚬”（《讀劉得仁賈島集二首》之二）、“無端爲五字，字字鬢星星”（《偶作》）、“思苦香消盡，更深筆尚隨”（《秋夜吟》），都是其清苦爲詩的自我記錄。與唐五代的大部分詩僧一樣，貫休也染苦吟之習，其山水詩也不免流露出苦寒幽冷之氣。如《秋末長興寺作》：

荒寺古江濱，莓苔地絕塵。長廊飛亂葉，寒雨更無人。

栗不和皴落，僧多到骨貧。行行行未得，孤坐更誰親？

幽靜的山寺、侵階的莓苔、紛飛的落葉、寒冷的秋雨，與僧家長日的誦讀參禪生活，相互映襯，透露出深深的清寒之氣。《登鄱陽寺閣》：

寺樓閑縱望，不覺到斜暉。故國在何處，多年未得歸。

寒江平楚外，細雨一鴻飛。終數於陵子，吳山有綠微。

起篇兩句寫登樓凝望，神馳故國的深情之狀。下兩句直抒胸臆。“寒江平楚外，細雨一鴻飛”，寫詩人極目眺望之思鄉情懷。平闊